

火热的8月,福建舰完成了第八次海试,被外界视为中国将正式迈入“三航母时代”的标志;中国第六代战斗机被军迷深入探讨;抗战题材影片《南京照相馆》成为今年暑期票房冠军,而另一部抗战题材影片《731》已定档“九一八”……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消息让人更加翘首期盼九三阅兵,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已进入高潮。

□本报记者 池沙洲 文/摄

中日两个国家,虽然一海襟带,风月同天,但是自从公元663年白江口之战以来,封建时代的日本统治阶层就多次以朝鲜为跳板,主动挑起大规模战争,伺机侵略中国,致使海波不静、生灵涂炭。

1895年,近代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割占台湾并取得巨额赔款,其原本遮遮掩掩的侵略野心至此昭然若揭。

直至1931年,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,占领中国东北全境,并扶持伪满洲国,号称“日本的生命线”,将中华民族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。

“吾闻用夏变夷者,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”(孟子)同年,马占山将军指挥了江桥抗战,打响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。

至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,一首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随着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唱响全国,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斗志。

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他们最优秀的儿女杨靖宇、赵尚志、赵一曼等进入白山黑水,吸收东北军旧部及其他爱国武装,成立东北抗日联军,谱写了抗日战争的初章。

国人千万不能忘掉,他们的死是为了谁

历史的宏大叙事常由一连串的年代、人名、地名、数字和专有名词构成,往往呈现在博物馆、纪念馆、官方公告和教材中,与普通人所处的生活和时代距离甚远,至于这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,这些故事对于今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,我们很难感同身受。

一些人对抗战史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考前背诵提纲的层面,存在着大片细节性的知识空白,忽略了对人为生命个体在战争中的感受。正如林徽因因为哀悼成都空战中阵亡的弟弟林恒所写的诗句:“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,你死是为了谁!”

具备二战史基础的人都知道,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,美军早已掌握了情报却未重视;但很少有人知道,破译日军密码的技术人员是一个中国人。

1943年,这位中国密码专家又一次侦得了绝密情报:日本海军最高长官山本五十六座机的行踪。这次美国人不再等闲视之,派出18架P-38战机将其击落,使这个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南太平洋的原始森林。

恰巧,这位谍报英雄是我的本家;更巧的是,我们的名字仅一字之差,他叫——池步洲。

1938年的初春,在中国鲁南的小城台儿庄,日军两个师团的钢铁洪流发动钳形攻势,打得第五战区“杂牌军”毫无还手之力。几经血战,兄弟部队死伤殆尽,一位师长带领残余人马在运河边苦苦支撑。

但他下令炸毁运河上的浮桥,断了自己和所部的逃生通路,喊出了:“这里是我们的光荣,也是我们的坟墓。”

得知外围友军靠近,他召集还能动弹的轻伤员和担架兵、炊事员、马夫等非一线战斗人员,发动最后的反攻,与友军里应外合,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。

中日全面开战以来,这场胜利的意义是空前的,它是中国军队首次在正面战场打赢了大规模歼灭战,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

还是凑巧,这位西北军将领、抗日英雄也是我的本家,名叫——池峰城。

“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。”(朱永新)抗战史的阅读不仅充实了我头脑中的知识库,也充实了我心灵上的能量库。我明显感觉到,穿越历史的厚重换来的是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轻快,在因内卷而焦虑的当下,自己没有像一些人一样陷入精神内耗,而是会更多一些勇气和力量,更有系统、有计划地挑战未涉足的领域,完成预设的目标。

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部《我的抗战》

我的抗战史阅读经历主要集中在2010年和

2015年之间。那时,国内抗战相关书籍出版和纪录片发行呈井喷态势,助力大众读者进行了一场抗战史“扫盲运动”。

当然,很多人觉得读史这件事无足轻重,但也有人像我一样毫不掩饰自己的知识盲区。记得早在2005年,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,主持人窦文涛在凤凰卫视纪录片《中国远征军》的开场白:“直到昨天,我才知道有这样一支军队,主动出击,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国门。这支军队的名字叫——中国远征军。”

今天回顾,这场“阅读运动”与当年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不无关系。2010年,经国际和国内多方数据核实,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,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
风水轮转,此消彼长,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被刺激,开始屡屡挑衅我国主权。至2012年,发展到在国际上掀起钓鱼岛“购岛”风波。

就在同一年,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服役,加上始自当年的钓鱼岛常态化巡航,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逐渐取得了对第一岛链的控制权。

中国政府历来重视近代史教育,历史翻到这一页,中国民众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:这一幕与百年前的甲午何其相似——来自海上的威胁赌上国运一战,中国的主力战舰全部葬身海底,洋务运动经营几十年的工业化之路戛然而止。

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全国上下纷纷担心和思索:如何才能不让历史重蹈覆辙。于是,从昔日抗战胜利的经验中汲取智慧,就成了应对新形势下抗战的不二之选。

还记得多少个睡前,日光灯下,我手捧书本,或张口结舌,或双眼湿润,或意气激昂,用不停的阅读来洗刷我对这段历史的无知。

钓鱼岛危机后,凤凰卫视又拍摄了纪录片《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纪实:血战松山》(2012年)和《重返野人山: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地探秘》(2013年)。

从此,滇西抗战走进了我的视野。我收藏了余戈的“滇西抗战三部曲”,其中第一部《1944:松山



□本报记者 许淑瑶 金竹
实习记者 俞盈盈

80年前,一架战机在湖南辰溪县的溪滩上迫降。飞机被击中,前起落架和发动机被打落,机身的高温烫得溪水滚滚蒸腾。

飞行员叫吴其韬,这不是他第一次死里逃生。在对日作战飞行的800多个小时中,他击落过5架敌机,奇袭过日军汉口机场,4次成功飞越了被称为“死亡航线”的驼峰航线……

那次迫降后,当地百姓涉水而来,合力将吴其韬救下。被悉心照料5天后,他徒步80千米,搭上卡车,返回芷江空军基地。

5个月后,1945年9月9日,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。吴其韬亲历了这来之不易的历史时刻。他曾说:“这20分钟的精髓,贯穿我的一生,影响我的一生,升华我的一生。”由于战功卓著,吴其韬被盟军总部授予“飞行优异十字勋章”和“航空奖章”。

“我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,是在他2005年生病之后。前几十年,我们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。”吴其韬的儿子吴缘回忆说,“那时候的他话很少,只是常在信中嘱咐我,要好好做人。”

2005年,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,吴其韬受邀参加湖南芷江“国际和平文化节”。吴缘陪同年迈的父亲前往芷江——当年飞虎队的驻扎地,也是抗战受降地之一。当吴其韬时隔半生再次来到那片溪滩时,眼前平静的水面仿佛又随着生死一线的记忆翻涌起来。

找回那些名字

由于父亲晚年不便应对频繁的采访,吴缘便辞去工作,寸步不离地陪伴父亲。他也开始注意到,父亲身边那些安静的老人,似乎都藏着未被讲述的往事。渐渐地,他学会了倾听、询问、比对,捕捉只言片语中散落的线索。

2010年,吴其韬逝世。彼时,中国

大陆的抗日飞行员老兵仅余一人。吴缘感受到时间的紧迫,便与几个朋友开始系统性地寻找抗战老兵。

“其实,要找到他们并不难。”吴缘说,“你只要到村子里问问,有没有90多岁、当过兵的老人,大多都能找到线索。”

吴缘仍记得去淳安瑶山乡找吴金贵的那次,从杭州坐长途车转中巴,再坐摩托车翻山越岭,直到山顶断路处,才见到这位参加过衡阳保卫战的老兵。那场战斗创下了抗日战争中最长的守城纪录。

还有一次是在临安於潜镇,吴缘和志愿者根据当地人的指引,来到山上的一处守山人的防护点。独居的老兵蔡凌云就住在这里,潼关之战的弹片曾穿进他的肚子。当志愿者到来时,这里刚经历过一场山洪,防护点满是淤泥。

找到家门不易,打开家门更难。吴缘曾在天目山下的一个村子找到一位老人。但即便是拿着当年的老照片和名册一页一页比对,老人也不肯提起自己的战斗往事。吴缘前后去了5趟,对方才开口。

在吴缘和志愿者的坚持下,一个个曾被遗忘的名字渐渐浮出水面。20年来,他和朋友们找到了1300多位抗战老兵,而如今,浙江省内健在的老兵已不到百人。

“找到他们还不够,更重要的是陪伴。”吴缘说。在政策的有力支持下,老兵大多并不缺衣少食,真正需要的是“一个愿意听他们讲讲的人”。直到吴缘和志愿者坐下来,老兵们才慢慢敞开心扉,讲述曾经的战斗、牺牲与思念。

每当老兵身体抱恙,吴缘就会前去探望。建德老兵童亚杰说:“你来看我一次,我至少能多活半年。”在1945年8月发生于临安昌化的河桥战役中,童亚杰曾奋勇激战。那是抗战的尾声,日寇溃退河桥不久,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

“我们只是想在每个节日告诉他们,大家没有忘记他们。”吴缘说。

这些年,吴缘也见证了许多人的变化。很多老兵的子女起初并不理解,但在志愿者一次次探访后,他们开始改变。有位老兵的儿子坦言:“你们和我

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,却这么上心,我们要是再不管他,还算什么儿女?”还有家属主动加入志愿者队伍,走进更多老兵家中。

让忠魂不再飘荡

除了陪伴健在的老兵,吴缘还有一项重任:为那些未能归家的烈士,找到名字,找到归处。

2015年,吴缘在湖南长沙春华山中央阵亡将士墓发现了118位浙江籍抗战将士。志愿者花了4个月确认了他们的身份,最后将他们迁回杭州的陵园。

后来,吴缘又听闻湖北宜昌一处工地发现了3000具烈士遗骸,那是枣宜会战中阵亡的将士,不少人出生于浙江。他再次动身,只为让英灵归根。

有位107岁的杭州老兵曾说:“我不是抗日英雄,在战场上死去的才是真正的英雄。他们死了,我活着,我要为他们讲话。”空军老兵彭嘉衡亦言:“我不是英雄,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。”

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毕业生龚业梯回忆,与他同班毕业的33人中,24人在抗战中牺牲。学校中央石碑上遒劲的文字镌刻着他们的誓言:“我们的身体、飞机和炸弹,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!”

自卢沟桥事变至日本投降,笕桥中央航校培养了16期共计1700多名飞行员。他们既是少数人,在严苛制度下完成了全部飞行训练;也是忠心报国的多数人,一腔热血投笔从戎,甚至将年轻的生命献给了天空上的战场。

吴其韬曾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:“只想杀敌报国,夺回东三省。”

慨然如文天祥,久经沙场,死固付之度外,但求鞠躬尽瘁,死得其所。烽火连年,校歌这样唱出他们的初心:

“得遂凌云愿,空际任回旋;报国怀壮志,正好乘风飞去。长空万里,复我旧河山。努力!努力!民族兴亡责任待吾肩。须具有牺牲精神,并展双翼一冲天。”

(更多关于战争的思考,详见《中学生天地》9月刊A版《我们与战争的距离》组文)

让抗战精神的每一股涓流汇入华夏血脉

我的抗战阅读史



吴其韬(左一)和他的战友们



努力! 长空万里, 复我旧河山